

鲍勃·迪伦反战思想的伦理困境：兼论其战争伦理的嬗变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Bob Dylan's Anti-war Thought and the Evolution of His War Ethics

方 质 (Fang Zhi)

内容摘要：鲍勃·迪伦常被视为反战歌手，但其战争叙事远非单一的反战标签所能概括。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出发，通过历时性分析迪伦自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相关作品，揭示其战争观念的嬗变与内在伦理困境。迪伦早期作品如《在风中飘荡》《战争大师》展现出对战争本质的质疑与对军工复合体的批判，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然而，随着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其宗教身份的转向与犹太文化根源的复杂性，迪伦的战争叙事逐渐从社会抗议转向内在精神探索，并在《街坊恶霸》中引发关于民族立场与普遍道义之间张力的伦理困境。本文认为，迪伦的战争伦理虽历经演变，却始终围绕个体苦难、人性批判与宗教超越展开，其思想核心是一种以个体苦难的人道主义关怀为基点，并寻求神学维度超越的复杂伦理体系，而非简单的政治立场表达。

关键词：鲍勃·迪伦；反战思想；伦理困境；战争伦理；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方质，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音乐与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Bob Dylan's Anti-war Thought and the Evolution of His War Ethics

Abstract: Bob Dylan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anti-war singer, yet his war narratives far exceed the confines of this singular label. Employ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conducts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Dylan's relevant work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 revealing the evolution of his views on war and his inherent ethical dilemmas. Early works such as "Blowin' in the Wind" and "Masters of War" demonstrate profound skepticism towards the nature of war and critique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reflecting a strong humanitarian concern. However, with shifts

i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particularly his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mplexities of his Jewish cultural roots—Dylan's war narratives gradually transitioned from social protest to inward spiritual exploration. This shift sparked controversy in works like “Neighborhood Bully,” highligh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national stance and universal moral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though Dylan's war ethics evolved over time, a persistent focus on individual suffering and a movement towar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 can be identified as its core trajectory. The framework of his thought is thus anchored in humanitarian care for individual suffering and extended toward theological transcendence, rather than being a mere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stance.

Keywords: Bob Dylan; anti-war thoughts; ethical predicament; war ethic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Fang Zhi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music and literature (Email: pheryman@163.com).

鲍勃·迪伦 (Bob Dylan) 其人常被公众冠以“反战”的标签，这与其早期作品所涉及的大量反战叙事密不可分。迪伦在 1961 年至 1965 年间发表了至少 12 首紧扣战争话题的作品，足见其对战争问题的关切。多数研究者以这些作品为切口，从不同视角阐发了迪伦的反战思想，如陈建文借“风”的意象分析，指出了迪伦作品中审美意味与反战思想的有机结合¹，又如郑春生通过迪伦的“自塑”和媒体的“他塑”对比了迪伦艺术生涯前后期的反战形象²。迪伦的反战思想在学者的研究和媒体的造势下看似逐渐深入人心，但也有研究在肯定迪伦反战精神的同时，注意到了其反战叙事背后所掺杂的更为复杂的情结。例如有研究认为“迪伦对战争的态度偏向于内心的纠葛 (……) 他的宗教身份也影响着 他对于战争正义性的判断，尽管迪伦对于战争持普遍的反对态度，但当他置身于宗教语境中时，又不免 (克制地) 流露出本能的复仇心态” (陈恒汉 方质 118)。滕继萌也曾表示，迪伦的“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 (35)。这部分观点使得迪伦反战这一“定论”被暂时悬置，如何准确、客观地认识和解读迪伦的战争叙事成为了一个亟待深究的话题。

汪正龙认为：“战争文学和战争描写从个体、他人、群体、民族、国家、人类等的临界状态透视个体的体验与命运，构成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民族情

1 参见 陈建文：“《答案在风中飘》中的风意象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7）：147-150。

2 参见 郑春生：“论 20 世纪 60 年代鲍勃·迪伦形象的自塑与他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0）：124-133。

感认同与人类情感认同、历史见证与心灵见证等复杂的矛盾关系”（25）。这一观点表明认识和解读迪伦战争叙事的本质在于探究其对战争的观点和态度，也即探究迪伦的战争伦理。关于如何科学地理解文学，中国学者创立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聂珍钊 14）。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历时地分析迪伦战争观念的嬗变及其形成的伦理困境以揭示迪伦的战争伦理。

一、迪伦反战思想渊源及早期反战叙事

迪伦反战思想的萌芽植根于其所处的特定伦理环境。迪伦的传记作品揭示了他幼年的生长境况：“我生于1941年春天。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得如火如荼，美国也很快就要参战。世界被炸得四分五裂，混乱像拳头一样打在每个新出生的人的脸上（……）1951年我上小学了。我们学的一件事就是当空袭警报响起时要躲到书桌底下，因为俄国人会用炸弹攻击我们”（*Chronicles: Volume One* 28-29）。这些战争记忆一方面象征着迪伦在伦理混沌阶段对于战争现象层面的懵懂认知，同时也是迪伦具备伦理观念后对于幼年所面临的战争问题的重新审视。迪伦继续写道：“这些俄国人就是几年前和我的叔叔们并肩战斗的俄国人。现在他们变成了来割开我们的喉咙、烧死我们的怪兽。这好像很奇怪。生活在这样的恐惧阴云下剥夺了一个孩子的精神”（*Chronicles: Volume One* 29）。幼年时对于战争和死亡本能的恐惧在迪伦的描写中呼之欲出，他对于二战前后敌我双方关系问题的困惑，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战争本质的伦理问题——战争中的善恶、敌友界限往往是人为建构的，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个体的伦理观念往往形成于特定的伦理环境之中，而迪伦童年所经历的战争与冷战环境，恰恰构成其反战思想形成的最初伦理语境。

及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进入了剧烈的变革之中，这一时期的特殊伦理环境为迪伦的反战叙事提供了直接的社会动力与创作灵感。美苏冷战对峙下的古巴导弹危机将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而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及其残酷性的显现，在美国国内催生了汹涌的反战运动浪潮。“作为表现强烈情感和含有丰富想象的诗歌，则可说是作者伦理观的一种含蓄表达”（刘茂生 172）。在此历史背景下，迪伦开始通过诗歌作品的创作来展现其对社会的关怀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作动机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深受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等“垮掉派”诗人深刻影响了迪伦的创作¹，《地下乡

1 参见王焘：“‘嚎叫’之后的时代强音——探析金斯堡对鲍勃·迪伦创作的影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2013）：91-97；宋玮：“从‘垮掉’到‘叛逆’——凯鲁亚克对鲍勃·迪伦创作影响探析”，《济宁学院学报》1（2021）：27-31。

愁蓝调》（“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1965）的歌名灵感就来源于凯鲁亚克的作品《地下人》（*The Subterraneans*, 1958），而金斯堡本人则出现在了这首歌曲的音乐视频中，如图1所示。



图1 《地下乡愁蓝调》音乐视频截图¹

有评论认为，迪伦和金斯堡的关系胜似兄弟乃至父子，“他们发现彼此都有天赋，于是在一些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并且在长期的友谊中相互称赞”（Wills, “Allen Ginsberg and Bob Dylan”）。在诗歌创作上，“金斯堡的创作主旨不同于惠特曼的赞美诗学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他认定必须不遗余力地揭示惠特曼在诗歌中淡化处理的社会问题（……）以痛苦和绝望来唤醒精神麻木的世人”（刘树森 48、50），而“迪伦受其影响，认为歌曲应注重思想性，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生境遇的各个层面，并不仅仅用来娱乐和消遣。他主张创作须从单一爱情题材的框架中跳出来，将笔触伸向更丰富的社会现实和更深层的文化层面”（王垚 95）。这种创作主张的形成，体现了迪伦作为艺术家的理性意志，即主动承担起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伦理责任。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这种理性意志的选择标志着迪伦已经开始确立其作为社会观察者和批判者的伦理身份。

迪伦的反战叙事作品主要集中于其1961年至1965年期间发行的专辑²中，其中最为经典的作品莫过于《在风中飘荡》（“Blowin’ in the Wind”，1963），尼克·科恩（Nik Cohn）称其为“首支登上排行榜的反战歌曲”（170）。迪伦在该作品中写道：

是啊，加农炮弹要飞多少回

1 参见 Bob Dylan, “Bob Dylan - 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 (Official Video),” *YouTube*, 10 Oct.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xjIBEvx0>, Accessed 8 Sept. 2025. 在本图中，位于画面右侧（前方）的就是鲍勃·迪伦，位于画面左侧（后方）的则是艾伦·金斯堡。

2 包括《自由不羁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 1963）、《时代正在改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1964）、《鲍勃·迪伦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 1964）、《全数带回家》（*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1965）。

才会永远被禁止？
 答案啊，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
 是啊，要多少人丧命，他才知道
 已有太多人死去？
 答案啊，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暴雨将至》 143-144)

从这些诗行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迪伦对于战争的反对，但对于“炮弹何时才能被永远禁止”“多少人丧命后才知已有太多人死去”这两个问题，迪伦没有武断地给出答案。他将上述问题与其它难以回答的且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并置，并用“答案在风中飘荡”隐喻了他对战争本质问题看法的不确定性。在同一专辑的另一首作品《战争大师》(“Masters of War”, 1963)中，迪伦着重批判了作为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武器，他写道：

来吧，你们这些战争大师
 你们造了所有的枪支
 你们造了死亡飞机
 你们造了大型炮弹
 {……}
 你们一事无成
 除了建造毁灭性的事物

(《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暴雨将至》 149)

在这首作品中，迪伦深化了他对于战争问题的思考，对于这些武器的批判实则指向了他对于美国军工复合体¹的批判。根据迪伦自己的说法，《战争大师》“应当被理解为一首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歌曲。它并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反战之歌。它所反对的，是艾森豪威尔在卸任总统时所提到的那个‘军工复合体’。那种精神当时弥漫在空气中，而我把它捕捉到了”(qtd. in Gundersen, “Dylan is positively on top of his game”)。此处迪伦所说的“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歌曲”更多地强调道德立场，反对战争带来的暴力、杀戮与非人性，而“传统意义上的反战之歌”则更多是从政治或社会立场出发反对某场战争或战争政策。由此得以窥见，迪伦早期的反战叙事由对战争表象的

1 关于军工复合体这一概念，可参见 章节根、沈丁立：“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美国研究》2(2004)：25-39、3-4。

关注转向了对战争实质的剖析，这也为后续分析其战争伦理观奠定了基础。

归结来看，迪伦早期的反战叙事大多和其所处的伦理环境，即 20 世纪 60 年代动荡的美国社会有关，其早期反战叙事不仅是对战争现象的直接反对，也暗藏着迪伦对战争本质的谨慎思考。然而，伴随着一系列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及迪伦个人的意外遭遇所导致的伦理环境的改变，迪伦的战争叙事作品在 1965 年前后开始减少，其创作焦点，呈现出一种自我回归的内省趋势。尤其是迪伦对于自身宗教身份的重新审视，一度使其反战思想陷入伦理困境。

二、迪伦战争观念的嬗变及其伦理困境

迪伦在传记中写道：“我曾经遭遇一场摩托车祸并因此而受伤（……）生儿育女改变了我的生活，把我从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中分离了出来。在我的家庭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保持真正的兴趣，我开始用不同以往的眼光来看待每件事物”（*Chronicles: Volume One* 114）。这次意外加之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等人遇刺的社会事件使得迪伦一度陷入伦理混乱。迪伦伦理混乱的具体表现是其对自身宗教身份的探索。迪伦出生于犹太家庭，其先天的犹太人身份是理解其思想的核心线索。然而 1979 年至 1981 年间，迪伦出人意料地连续发行了三张具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专辑，即所谓的“基督教三部曲”，标志着其信仰的一次重大转向。在 1966 年迪伦遭遇车祸到其发行“基督教三部曲”期间，他的宗教观处于一种动摇的状态，“一方面，对上帝的信仰反复动摇，对传统的宗教教规有着深深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作为诗人的鲍勃·迪伦又常常依靠上帝的情感来抚慰自己内心的痛苦”（李欣奇 23）。这种精神世界的剧烈动荡必然会影响到其对于战争、暴力、正义等伦理问题的判断。“基督教三部曲”时期的作品充满了末世论、罪与救赎的基督教主题。迪伦的战争伦理在此阶段似乎经历了一次以神圣秩序为依据的重构。他不再仅仅从社会政治层面批判战争，而是试图从神学维度寻找战争的根源与人类的出路。这种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战争叙事从具体的社会抗议，转向了更为抽象的精神斗争与终极关怀。这也解释了为何其作品中直接涉及现实战争题材的比例显著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迪伦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其与犹太传统的关系并未彻底断绝。“1983 年 9 月，迪伦在耶路撒冷参加了他儿子杰西的成年礼”（Taylor and Israelson 131）。此类生活事件引发了外界关于其向犹太根源回归的推测。然而，迪伦本人对此有其辩证的认知。研究者指出，“在种族和文化上，迪伦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仍然是犹太人。这是他身份的一部分，并将一直伴随着他。然而这并不等同于他是犹太教的信徒”（Taylor and Israelson 131）。迪伦在某次访谈中被问及其犹太传统时表示：“是的，这些是我的根源，我想是这样。我在寻找它们吗？嗯，我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在有六角星（指的是大卫之星）的犹太会堂里寻找它们”（Jarosinski 755）。这表明迪伦试图区分

文化身份上的犹太属性与宗教信仰上的基督教选择。然而这种精密的区分在公众视野和作品解读中是模糊的，这也加剧了其战争伦理的复杂性。

公众常常将《街坊恶霸》（“Neighborhood Bully”，1983）作为解读迪伦中后期战争叙事及其战争观念嬗变的关键文本。与《在风中飘荡》的普世诘问和《战争大师》的直白控诉不同，这首歌在评论界引发了巨大争议。有观点认为，“这不是迪伦隐喻性较强的作品，它也几乎没有包含作者惯用的精彩意象，只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对以色列的支持”（Rovics, “Genocidal Ironies”）。迪伦在《街坊恶霸》中通篇采用了一种受害者叙事的视角，他写道：

街坊恶霸被逐出每一片土地
他在地球上游荡，一个被放逐的人
他的家人流落四方，他的人民饱受侵扰
他永远因为降生而受审

（《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帝国滑稽剧》 139）

歌词的“直截了当”以及修辞上的极端化倾向与其早期反战作品形成了巨大张力，这正是其伦理困境的外在显现。当迪伦将早期用于控诉“战争大师”的悲愤，转向为描述本民族历史遭遇的激烈辩护时，其反战思想的纯粹性在公众视角下便受到了质疑。罗维克斯指出了这种矛盾：“一个在美国如此雄辩地支持黑人平权的人，怎么会在面对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公然剥夺与压迫时表现得如此盲目？一个曾写出猛烈批判美国战争机器诗句的人，又怎么会在同时期（……）拥护那个获得美国最多军事援助的国家呢？”（“Genocidal Ironies”）这种表面上矛盾的政治观点恰恰揭示了迪伦内在的伦理身份冲突——作为反战先锋的迪伦与作为犹太民族一员的迪伦，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伦理诉求似乎指向了不同的方向。

然而若将《街坊恶霸》简单归为政治歌曲，则可能遮蔽了文本更深层的伦理意涵。面对争议，迪伦曾试图澄清其创作意图：“《街坊恶霸》不是一首政治歌曲，因为如果是的话，它就属于某个政党。如果你说这是一首以色列的政治歌曲——即使它是——仅在以色列大概就有 20 个政党。我不知道它会属于哪个政党”（Loder, “Th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 Bob Dylan”）。迪伦的这一辩解与歌词所采用的受害者叙事视角及“街坊恶霸”这一泛化称谓相呼应。这种叙事策略将描摹对象从一个具体国家置换为一个“被逐出每一片土地”“永远因为降生而受审”的普遍化受难者形象，从而在文本层面营造出一种超越具体政党政治、直指民族生存困境的悲剧氛围。因此，与其争论歌曲的政治属性，不如关注其文本的核心修辞效果，即通过调动深植于犹太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创伤体验，唤起对历史性苦难的共情与对生存权的辩护诉求。此外，迪伦的伦理选择有时亦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迪伦的一位私人助

理曾透露，“迪伦不喜欢拉比的政治权力，在找到耶稣之后也没有兴趣寻找另一位弥赛亚，但他的唱片公司对拉比的压力做出了回应，一度威胁不发行迪伦的下一张专辑”（Taylor and Israelson 134），因此迪伦有时不得不参加一些犹太教活动以帮助唱片公司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得见，对迪伦公开言论与作品的解读，需要置于其复杂的伦理身份、变动的思想历程以及不可避免的商业、社会压力等多重语境中进行综合考量。他的辩解（如声称歌曲非政治性）本身，既可被视为其艺术理念的一种真诚表达，同时也可能是在特定舆论环境下，对其作品可能引发的政治解读进行疏导或对自身立场进行保护的一种策略。这并非断言其言论不实，而是揭示其公众表达层的多维性与复杂性。

三、迪伦战争伦理中的人道主义基点与神学超越

前两部分的历时性分析表明迪伦的战争叙事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思想内部存在着因伦理身份冲突而导致的张力与嬗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迪伦的战争伦理是破碎或自相矛盾的。相反，如果超越单纯的政治立场判断转而深入其文本肌理与思想核心便会发现，贯穿其创作生涯主线的，是一种基于深切人道主义、聚焦个体苦难并在宗教精神中寻求超越的战争伦理。

探讨迪伦的战争伦理，首先需要明确迪伦对于战争性质的基本态度。传统的战争伦理主要围绕纵容主义（或现实主义）、和平主义与正义战争理论展开论争。¹ 迪伦的早期作品清晰地表现出对现实主义战争伦理的批判。“现实主义对待战争基本上持一种非道德性立场，认为战争与道德无关。国家之间一旦开战，道义上的考量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更应该关注自身利益，而不是伦理道德”（左高山 43）。前文所述的《战争大师》正是迪伦对这种非道德性战争逻辑的抨击。这首歌的伦理力量在于它剥去了战争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崇高外衣，揭示了其背后冷血的、以利润和权力为驱动的非人性逻辑。在这里，迪伦的立场接近于一种道德上的绝对批判，他拒绝接受“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 43）这一现实主义命题中所隐含的道德豁免权。然而，迪伦并非一个纯粹的、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他本人曾对“和平主义”这一标签表示怀疑：“和平主义是一种哲学吗？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我不太喜欢这些词，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喜欢和平主义、右派、左派、军国主义、共和主义这些宽泛的术语”（Jarosinski 836）。这种对标签的拒斥，暗示了他的战争伦理不愿被任何现成的理论框架所束缚。他批判现实主义的非道德性，但也不完全认同绝对和平主义对一切暴力的无条件拒斥。这使得他的战争伦理具有一种复杂的、情境化的特质。

1 参见 罗成翼、刘利乐：“战争伦理综论”，《湖南社会科学》2（2012）：21-24；刘戟锋、曾华锋：“战争伦理：一种世界观念”，《伦理学研究》4（2006）：85-89；左高山：“正义的战争与战争的正义——关于战争伦理的反思”，《伦理学研究》6（2005）：43-48。

如果说对现实主义战争逻辑的批判构成了迪伦战争伦理的出发点，那么对战争中个体命运与身心创伤的关注，则是其最核心、最稳定的人道主义内核。这一特点与战争伦理研究中超越宏观道义与武器批判，进而聚焦于人本身的视角深度契合。如罗成翼、刘利乐认为，战争伦理在军事伦理（战争道义性）与军备伦理（战争手段）外，还包含至关重要的军人伦理维度，即对战争主体道德责任的探讨。¹虽然该理论传统上多聚焦于军人及科技工作者等直接参与者，但迪伦的书写极大地拓展并深化了这一维度的内涵。他将叙事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承担战争残酷后果的个体——无论是前线的士兵还是后方的平民，就此将军人伦理所关切的主体，从战争的执行者延伸到了战争的承受者，赋予了这一理论范畴更丰满的人道主义意涵。这一伦理取向在作品《约翰·布朗》（“John Brown”，1963）中得到了体现。该作品通篇没有评判战争本身的正义与否，而是将笔墨聚焦于一个普通士兵参战前后的骇人蜕变：

约翰·布朗从军到外国去打仗
 他的母亲真以他为傲！
 穿着军服他看上去高大又挺拔
 母亲看了眉开又眼笑
 （……）
 哦他脸上布满了伤疤一只手也给炸没了
 他的腰部还围着一道金属支架
 他低声慢慢说话，她听不出他的声音
 连他的脸她都认不出来！

（《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暴雨将至》 126-127）

迪伦通过细致的身体书写将抽象的战争灾难转化为一具具体、破碎、触目惊心的肉体。母亲从眉开眼笑到惊骇莫名的情感转变强化了这种创伤的悲剧性。这种叙事策略与汪正龙所指出的 20 世纪战争文学特点高度一致，“不仅注目于战争过程本身残酷性的描写，而且更多地注视与沉思个体的人在战争中的体验与感受，常常具有更为明显的反战倾向”（27）。迪伦的战争伦理，在这里体现为一种向下的视角，它从宏大的政治叙事、民族纷争回落到每一个被战争机器碾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即便是备受争议的《街坊恶霸》也可从这一视角进行解读。当迪伦刻画那个被放逐的恶霸时，他或许并非是在进行一种民族主义的辩护。相反，其情感力量的根源依然是对集体性创伤的描绘，是对无数个“约翰·布朗”所遭受的流离、迫害与苦难的共情。尽管外界的解读焦点常集中于其政治立场，但其伦理关怀的落脚点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对苦难中个体与群体的悲悯。

1 参见 罗成翼、刘利乐：“战争伦理综论”，《湖南社会科学》2（2012）：21。

迪伦对宗教的思考还为其战争伦理增添了一个超越世俗政治的维度。作品《上帝在我们这一边》（“With God on Our Side”, 1964）以反讽的笔触揭示宗教如何被战争意识形态所利用。迪伦在作品中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这一命题与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乃至冷战对峙并置，细数了历史上以神之名进行的战争与屠杀，其伦理力量在于深刻地揭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这一口号如何成为一种最便捷、也最危险的道德正当化借口。作品的升华之处在于迪伦将这一诘问从历史政治领域引向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作品倒数第二个段落，他引入了犹大背叛耶稣的典故：

在许多黑暗时刻
我始终思索此事
耶稣基督
曾被一吻背叛
但我无法代你思考
你得有自己的观点
加略人犹大是否
让上帝站到了他那一边

（《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地下乡愁蓝调》 20）

该典故直接将上帝在哪一边这个问题的荒谬性推向了顶点。若连犹大的背叛都可被解读为执行神意，那么任何战争岂不都能被包装为神圣？迪伦并未给出答案，而是把思考的责任交还个人——“但我无法代你思考 / 你得有自己的观点”，以此否定了任何政治或宗教权威对神圣的垄断解释，使信仰重新回到个体的良知与选择。理解了这首歌对宗教工具化的深刻警惕，便能更好地洞察迪伦宗教转向后的伦理困境与超越。皈依基督教后的迪伦不再频繁地书写战争主题而转向对内在之罪的探求，其行为本质是一种战争伦理的内向化升华——战争之恶并非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普遍的堕落。迪伦在结尾唱道：

如果上帝在我们这一边
他会拦阻下一次大战

（《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地下乡愁蓝调》 20）

这是一个疲惫灵魂对于和平最质朴的祈求。至此，基督教教义中的怜悯、救赎与他的人道主义情怀相互融合，使其战争伦理在神学层面得到了深化。

鲍勃·迪伦的战争伦理并非一个静态的思想体系，而是呈现为一个在历

史语境、个人境遇与身份认同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早期创作植根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反战运动的伦理语境，主要从普世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战争的暴力本质与军工复合体的非道德逻辑进行了批判。然而，随着个人遭遇、社会动荡及其自身深刻的宗教探索，迪伦的伦理关注点发生了内转与深化。其“基督教三部曲”时期的作品，将战争之恶的根源追溯至人性普遍的罪性，从而在神学维度上重构了对暴力与救赎的理解。这种嬗变在《街坊恶霸》中引发了显著的阐释张力，使其战争叙事陷入了特定的伦理困境。表面上看，迪伦从早期对战争机器的普遍控诉转向了对特定民族生存权的辩护，这似乎构成了一种立场的悖反。然而，若依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原则，回归其创作时的具体伦理环境，“充当文学作品中某个人物的代理人，做他的辩护律师，从而做到理解他”（聂珍钊 256），那么这种转变便可被视为其伦理身份——同时作为具有人道关怀的艺术家与承载着历史创伤的犹太裔个体——在特定历史时刻复杂互动的结果。贯穿这一嬗变过程的主线并非政治立场的摇摆，而是一种始终如一的、对承受战争苦难的个体生命的悲悯。无论是《约翰·布朗》中对士兵身体创伤的刻画，还是在《上帝在我们这一边》中对战争意识形态滥用神圣名义的反讽，其战争伦理的落脚点始终是具体的、被战争机器所碾压的人。因此，迪伦战争叙事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某种确定的教条答案，而在于通过其充满内在张力的叙事，持续地叩问战争的伦理本质，并坚定地捍卫个体生命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价值与尊严。

Works Cited

- 陈恒汉、方质：“隐喻·见证·哲思——鲍勃·迪伦战争书写的三个维度”，《当代外国文学》1（2023）：112-120。
- [Chen Henghan and Fang Zhi. “Metaphor, Witness and Introspecti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ob Dylan’s War Writing.”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2023): 112-120.]
- 陈建文：“《答案在风中飘》中的风意象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7）：147-150。
- [Chen Jianwen. “A Study of Wind Image in ‘Blowin’ in the Wind’.”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4 (2017): 147-150.]
- Cohn, Nik. *Awopbopaloobop Alopbamboom: The Golden Age of Rock*.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6.
- 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暴雨将至》，奚密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Dylan, Bob. *Lyrics: 1961-2012. 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translated by Xi Mi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17.]
- ：《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帝国滑稽剧》，厄土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 *Lyrics: 1961–2012. Empire Burlesque*, translated by E Tu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17.]
- 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地下乡愁蓝调》,陈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 *Lyrics: 1961–2012. 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 translated by Chen Li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17.]
- , “Bob Dylan—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 (Official Video).” *YouTube*, 10 Oct.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xjIBEVx0>. Accessed 8 Sept. 2025.
- , *Chronicles: Volume On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4.
- Gundersen, Edna. “Dylan is positively on top of his game.” *USA Today*, 10 Sept. 2001. Available a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404091821/http://www.usatoday.com/life/music/2001-09-10-bob-dylan.htm#more>. Accessed 8 Sept. 2025.
- Jarosinski, Artur. *Every Mind Polluting Word: Assorted Bob Dylan Utterance (2nd Edition)*. E-book, Internet Archive, 2006.
- 李欣奇:《论宗教文化影响下的鲍勃·迪伦诗歌艺术创作》,2019年。西南大学,硕士论文。[Li Xinqi. *On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Bob Dylan's Poe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us Culture*. 2019. Southwest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刘戟锋、曾华锋:“战争伦理:一种世界观念”,《伦理学研究》4(2006):85-89。[Liu Jifeng and Zeng Huafeng. “Ethics of War: A Perspective of the Notion about the World.” *Studies in Ethics* 4 (2006): 85-89.]
- 刘树森:“历史语境中的诗人与民族诗歌话语的建构——惠特曼与金斯堡比较研究之一”,《国外文学》2(1998):43-50。[Liu Shusen. “Poets i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oetic Discourse: One of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Whitman and Ginsberg.” *Foreign Literatures* 2 (1998): 43-50.]
- Loder, Kurt. “Th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 Bob Dylan.” *RollingStone*, 21 June 1984. Available at: <https://www.rollingstone.com/music/music-features/the-rolling-stone-interview-bob-dylan-43446/amp/>. Accessed 8 Sept. 2025.
- 罗成翼、刘利乐:“战争伦理综论”,《湖南社会科学》2(2012):21-24。[Luo Chengyi and Liu Lile. “An Overview of War Ethics.” *Social Sciences in Hunan* 2 (2012): 21-24.]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Rovics, David. “Genocidal Ironies.” *This Week with David Rovics*, 15 Oct. 2023. Available at: https://davidrovics.substack.com/p/genocidal-ironies?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Accessed 8 Sept. 2025.
- 宋玮:“从‘垮掉’到‘叛逆’——凯鲁亚克对鲍勃·迪伦创作影响探析”,《济宁学院学报》

1 (2021) : 27-31。

[Song Wei. "From 'Beat' to 'Rebellion': An Analysis of Jack Kerouac's Influence on Bob Dylan." *Journal of Jining University* 1 (2021): 27-31.]

Taylor, Jeff and Chad Israelson. *The Political World of Bob Dylan: Freedom and Justice, Power and Si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滕继萌：“鲍勃·迪伦：一位摇滚艺术家、诗人的生平”，《外国文学》2（1996）：34-35。

[Teng Jimeng. "Bob Dylan: The Life of a Rock Artist and Poet." *Foreign Literature* 2 (1996): 34-35.]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von Clausewitz, Karl Philip Gottfried. *The Theory on War* Vol. 1., translated by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8.]

王焱：“‘嚎叫’之后的时代强音——探析金斯堡对鲍勃·迪伦创作的影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2013）：91-97。

[Wang Yao. "Howl after the 'Howl': The Influences on Bob Dylan's Works from Allen Ginsber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 (2013): 91-97.]

汪正龙：“文学与战争——对战争文学和文学中战争描写的美学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0）：25-31。

[Wang Zhenglong. "Literature and War: An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War Literature and the Depiction of War in Literature."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2010): 25-31.]

章节根、沈丁立：“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美国研究》2（2004）：25-39、3-4。

[Zhang Jiegen and Shen Dingli. "The Impact of U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on American Arms Control Poli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 (2004): 25-39, 3-4.]

郑春生：“论20世纪60年代鲍勃·迪伦形象的自塑与他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0）：124-133。

[Zheng Chunsheng. "On the Fabrication of Bob Dylan's Self-image and Social Image in the 1960s."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20): 124-133.]

左高山：“正义的战争与战争的正义——关于战争伦理的反思”，《伦理学研究》6（2005）：43-48。

[Zuo Gaoshan. "Just War and Justice of War: Reflections on Ethics of War." *Studies in Ethics* 6 (2005): 43-48.]